

概述

云南的新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长壮大的过程。现代文学，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而发展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和文化专制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五·四”运动以后，云南有了新文学的萌生，诚如艾芜所说，“中国南边极远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些青年，用文艺的形式，表现了那时一些人的灵魂和感情，并不是在‘五·四’那样大浪潮中，完全无声无息的。他们大声呐喊过，沉痛地诅咒过，失望地悲伤过，热忱地向往过美好的未来，是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①“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云南出现了柯仲平、陆晶清、梅绍农、雷渊波、罗铁鹰、杨明、彭桂萼以及长期生活在云南的陈常枫、包白痕等一批优秀诗人，张天虚、马子华、白平阶、李寒谷、宣伯超、周谔、欧小牧（兼杂文家）、李乔等一批优秀小说家，施章、徐嘉瑞、刘尧民、杨鸿烈、姜亮夫、周泳先等一批优秀文学学者，罗稷南、楚图南等一批优秀文学翻译家。云南作家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有雷渊波、张天虚、马子华，参加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有陆万美、刘御（胡采），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有刘嘉谔、陈小航（罗稷南）、徐嘉瑞，可见云南文学工作者并不落于时代之后。抗日战争时期，内地作家、学者云集昆明等地，文学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文学活动蓬勃发展，西南联合大学等高等学府一大批从事文学活动的师生，头角峥嵘，当时及此后几十年，他们曾震烁全国文坛，云南曾是他们的文学温床或摇篮。他们对云南文学的繁荣，起过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云南现代作家中许多人遭受劫难，书毁人亡，现代文学成为“重灾区”，因此云南现代文学至今已鲜为人知。加之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云南文学素不登全国性文学史的大雅之堂，各种现代文学史多不述及云南作家作品，云南现代文学简直有被埋没的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1990年的云南当代文学，大致可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1950~1965年，是创立和发展阶段；1966~1976年，是挫折和停滞阶段；1977~1990年，是转折和繁荣阶段。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便成立了云南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① 1983年为梅绍农新诗集《薜格的化石》所作的《序》。

1956年，又正式成立了云南省文艺界联合会及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1979年改为云南分会）。同时，创办《云南文艺》副刊和《文艺生活》月刊，1956年又创办《边疆文艺》。

云南作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数不多。尔后，有南下部队作家的数量涌现，有地方作家的迅速成长，有少数民族歌手的不断加入，这3部分作家，渐渐形成了云南文学创作队伍。

1950~1965年，可以说是云南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作家深入边疆民族地区，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变革、讴歌新的时代、描写新生事物的具有边疆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作品。但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作家们在满腔热情地歌颂新生活、新时代之时，却未能正确揭露生活中存在着的旧思想、旧习惯势力；作家们以轻快明朗的笔调把生活描写成田园牧歌之时，却一笔带过了生活中本来存在的坎坷与严峻。作品民族特色有余，思想深度不足；政治内涵尚好，文化底蕴欠缺。尤其是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批判了不该批判的作品，伤害了不应伤害的作家。1955年的“反胡风”，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9年的“反右倾”，使一些作家蒙受了不白之冤，也使一些作品遭到了无端的批判。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将“左”的错误推向了顶峰。云南省文艺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被诬为“裴多菲俱乐部”、“黑线组织”而停止活动，《边疆文艺》被迫停刊。作家，轻则遭到批判，重则遭到抄家、批斗、挂黑牌，甚至被投入“牛棚”和监狱。最后文联、作协工作人员和驻会作家一锅端，全部赶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经过几番打击和摧残，云南作家队伍已七零八落，难布阵势；云南文坛也一片冷落。

云南文学的复苏、转折与繁荣，是在1977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新时期到来之时。从1978年起，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开始恢复活动，召开了第三次云南省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选举了云南省文联和作协的新的领导机构。随之，《边疆文艺》复刊。各地州相继成立了文联和文协，相继创办了自己的文学刊物。云南文学界出现了一片欣欣的景象。老作家焕发了青春，中年作家硕果累累，年轻一代作家显出巨大的创作潜力。过去被剥夺了创作权利的作家随着政治上的平反昭雪又重返文坛，成了云南文坛的中坚力量。一些从未有过作家的少数民族，也开始出现自己的第一代文学新人。过去十分薄弱的文学评论队伍，渐渐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具有战斗力的队伍。到1990年底，云南作家协会会员已发展到600余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81人。

80年代云南文学的新姿态、新面貌，首先表现在创作题材的扩大上，除了在50年代的边疆民族题材的领域内继续作新的开拓和新的探索之外，历史题材、城市生活题材、知识青年题材、战争题材、法制题材、爱情题材、神话传说、山水风光及至武林剑侠题材，作家们都可自由涉足，禁区打破，使云南文学更加丰富多彩。其次，还表现为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表现方法的多样。云南文学除了继续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反映时代的风貌和云南地区的现实斗争生活之外，还广泛地借鉴了东西方文学的技巧和手法。不论是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意识流、生活流之类的技巧和手法，都作了大胆的尝试。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1990年间，云南作家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56部，中短篇小说集63部，诗集77部，散文、杂文、报告文学56部，儿童文学作品集45部，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

专著60部，数量、质量都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云南文学。但与此同时，也夹着一些灰色的、黄色的乃至政治上不健康的作品，云南文学界多次对它们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评。

二

云南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古代典籍和地方志中仅有零星记载，云南有民族文字的民族，如彝族、傣族、纳西族，其著作多为明、清典籍。16世纪时，流寓云南的四川文人杨升庵翻译记录过彝文经典，搜集有《古今歌谣》和《古今谚》。根据傣族傣文古典文论《论傣族诗歌》的记载说明，16世纪末，有许多用傣文记录的傣族民间诗歌。用汉文记载云南民间文学，首先是魏晋时期的典籍。《水经注》记录有《兰津古渡》的民歌以及《金马碧鸡》的传说。《华阳国志》记载过“沙壶”（最先是《袁牢传》记载，东汉杨终撰，《后汉书》为引录。）以及夜郎王出生的神话。以后，梁建方的《西洱河风土记》、窦滂的《云南别录》、徐云虔的《南诏录》、樊绰的《云南志》、王师周的《滇南俗略》等等，其中都记录有云南某地的民间传说或民间掌故。《万历赵州志》记载有星回节和酋长曼阿奴之妻阿南殉节的传说。《嘉靖大理府志》记载有慈善夫人的传说，以及诸葛亮一纵孟获、《辘角庄》、《妇负石》、段赤城诛蟒等传说。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行的《白国因由》载有佛教故事。嘉庆六年（1801）师范著《滇系》40册，其中第12册《杂载》收录有大理地区民歌《山歌九章》。民族的主要祭典、节庆作为风情在志书中有简略概述。

民族民间文学开始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在中国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在云南则是20世纪30~40年代的事。柯仲平、马子华、徐嘉瑞、周汝诚等，最早搜集云南民间文学。30年代问世的有杨成志的《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周汝诚的《丽江的山歌和牧羊歌》、马子华的《云南民间传说》、徐嘉瑞的《近古文学概论》。此外，还有慕侨的《云南边地民俗之鸟瞰》。《昆潮》杂志先后登载过宣威、丽江、晋宁、虹溪等地的许多民歌。嗣后徐嘉瑞作了长期考察之后，1943年开始《大理文化史稿》的写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及抗日战争中，许多学者、教授南下，他们提倡与实践民俗调查，使云南民间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民族感情高涨，以爱国热情看待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自尊自卫的精神随民族危亡而崛起。1933年，在昆明创办了《昆湖半月刊》，此后还继续有其他周刊或报纸陆续创办。这些刊物、报纸均刊有民俗的、民间文学的作品。《昆明民俗志导论》（江应梁）《么些族故事研究》（李霖灿）《金沙江情歌》、《云南彝民唱词集》（张镜秋）等著述、作品都是这段时间发表的。沦陷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因抗战而南迁，师生和研究人员到云南乡村进行民俗考察，推动了云南民间文学事业的开拓。这些考察人员中，马学良时间较长，所到地方较多。他研读彝文经典，从日常生活中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他深入路南、寻甸、宣威、禄劝、武定等地，搜集了大量资料，撰写过不

少论文。江应梁30、40年代在《西南边疆》、《边政公报》上也发表过不少的有关民族社会经济、婚姻制度、民族历史等的论文。楚图南于1938年在《西南边疆》上发表《中国西南民族考察记》。诗人柯仲平1938年8月将云南流传的革命民歌贴于革命圣地延安的墙头上；他1939年发表的论文《论中国民歌》里，又引用和评价了云南各民族的民歌。1939年白族民间诗歌《鸿雁传书》由凌霄记译，发表在《观察报》上。还有人写过《傣夷民族的风俗》。这些带有民族乡土气息的文化破土而出，使民族学工作者开始对云南引起了更大的关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南下的采风集——《西南采风录》其中有湘、黔、滇的民间歌谣，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为该书作序。光未然到弥勒县乡下采风，他采集的阿细人史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北门书屋出版。1948年姚荷生的《水摆夷风土记》问世。40年代末，活跃在云南农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文艺战士对民间歌谣也作了搜集。这些学者们对云南民间文学逐渐有所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工作，可分3个方面叙述。

一是抢救、整理工作。50年代初，只是个别人从事发掘工作。1953年云南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了彝族撒尼人长诗《阿诗玛》。长诗发表后不仅引起全国文艺界的重视，也推动了云南这一工作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1956年全省民间文学工作会议前后，曾派出3个调查组分赴红河、思茅、大理、丽江等地，对傣、白、哈尼、纳西、彝族等民间文学情况作了初步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整理发表的长诗，有傣族的《召树屯》、苗族的《红昭与饶觉席娜》、《勒加》彝族的《逃到甜蜜的地方》傣族的《生产调》、《逃婚调》等，并出现了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创作的《望夫云》、《玉龙第三国》等长诗。

1958年在中国民研会制订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十六字方针指导下，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规模空前的7个调查队分赴丽江、大理、楚雄、红河、文山、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州，对纳西、白、彝、哈尼、傣、壮、苗、瑶、傈僳、蒙古等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历时半年多的调查，发掘的资料数以万计，选编的长诗、民歌、故事等达500多万字；在此前后整理发表的长诗，有纳西族的《创世纪》、《相会调》，彝族的《梅葛》、《阿细的先基》傣族的《松帕敏和嘎西娜》、《娥并与桑洛》、《葫芦信》、《苏文纳和她的儿子》、《古老的傣歌》、《线秀》等还出版了一些集子如《云南歌谣》、《云南民族民间故事选》、《云南农谚散集》以及省外出版的《纳西族的歌》、《白族民歌集》、《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阿一旦的故事》等。

60年代前期，又陆续组织了10多个调查队、组，对耿马、金平傣族，德宏景颇族，澜沧拉祜族，昭通苗族，沧源佤族，迪庆藏族，小凉山彝族，怒江傈僳族、独龙族、怒族，兰坪、碧江、元江白族进行了调查；整理发表的长诗，有傣族的《朗鲸布》、傈僳族的《重逢调》、纳西族的《游悲》、彝族的《逃婚的姑娘》、壮族的《逃到远方做夫妻》、苗族的《昭莠俭和高柏施》等。与此同时，省作协先后编印了原始资料集20多本。就这样对全省大多数地区的主要民族文学情况作了初步的摸底。

10年“文化大革命”，不仅整个民间文学工作被迫停止，而且许多民间文学作品被打成毒草，遭到批判，所有资料也毁坏、流失殆尽。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1979~1981年间，先后有9个调查小组深入到傣、白、彝、藏、哈尼、纳西、景颇、阿昌、傈僳、基诺、德昂、布朗、蒙古等族地区进行抢救调查，搜集资料700多万字。《山茶》、《民族文化》创刊为民间文学作品增添了园地。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会成立及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特别是1984年开始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大大推动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抢救整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先后有15个地、州、市成立了集成办公室，又成立了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并在9个地、州、市举办了培训班，培训骨干，依靠当地本民族力量，按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要求进行发掘，积累了大量的故事、歌谣、谚语资料，根据集成体例已试编出版了《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云南彝族歌谣集成》、《纳西族东巴文学——祭天古歌集成》、《拉祜民间文学集成》、《傈僳族风俗歌集成》、《云南蒙古族民间文学集成》、《基诺族民间文学集成》、《拉祜族苦聪民间文学集成》、《云南摩梭人民间文学集成》、《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云南苗族民间故事集成》、《佤族民间故事集成》等。目前全省各县正在编辑县卷民间文学集成资料集。这些年来，新整理发表的长诗在100部以上如傣族的《兰夏西贺》、《相勐》、《叶罕佐与冒弄央》、《阿暖贡马纳》、《三只鹦哥》、《缅桂花》，壮族的《幽骚》，苗族的《古歌》，瑶族的《虹腮与蝉美》，德昂族的《达古达楞格莱标》，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藏族的《格萨尔——加岭传奇》，普米族的《熊巴佳佳和他的伙伴》拉祜族的《牡帕密帕》、《札努札别》景颇族的《凯刚和凯诺》傈僳族的《猎手的歌》，哈尼族的《奥色密色》、《哈尼阿培聪坡坡》，纳西族的《鲁摆鲁饶》，白族的《串枝连》彝族的《查姆》、《赛玻嫫》、《阿鲁举热》、《白蚩尼和白拍蒙》、《七色女》等。出版的集子达30种以上如《白族民间故事》、《景颇族民间故事》、《傈僳族民间故事》、《哈尼族民间故事》、《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故事》、《阿昌族文学作品选》、《崩龙族文学作品选》、《云南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事选》、《杨升庵在云南的传说》、《昆明的传说》、《纳西族民间故事选》、《彝族民间故事选》、《白族民间故事选》、《傣族民间故事选》、《傈僳族民间故事选》、《彝族叙事长诗选》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傣族古代文学理论《论傣族诗歌》。

二是研究和探索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除了发表单篇论文50篇左右，出版《白族文学史》（初稿）、《纳西族文学史》（初稿）外，还有尚未出版的若干“调查报告”，以及红河彝族、红河哈尼族、楚雄彝族、文山壮族、文山苗族、西双版纳傣族、德宏傣族、耿马傣族、沧源佤族的“文学概况”。由于“左”的影响，研究范围不宽，理论色彩不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号召后，研究工作对“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有所突破，不断扩大研究范围开拓研究领域，以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重视材料的文化特点及其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理论联系实际，敢于打破前人旧说，提出新的看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同时，提倡更新知识结构，开拓思维空间，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合理采用各种新的科学方法，开展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因而，无论专题研究、文学史研究、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研究，以及理论专著，

都取得了新进展。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以来共发表单篇论文700多篇,对文艺起源、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民俗与文学的关系、神话、史诗、歌谣、原始文化等都有一些新的探索。论文集出版的有《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文集》第一、二集,《傣族文学讨论会论文集》,《民族文谈》,《云南民间文艺源流新探》以及朱宜初著《民族民间文学散论》、赵银棠著《玉龙旧话新编》、陶学良著《彝族文学杂俎》、晓雪著《浅谈集》。在文学史研究方面,除了16种文学概况编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外,还出版了《白族文学史》、《楚雄彝族文学史》、《傣族文学简史》。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已列入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达任务,由云南省负责编写彝、白、哈尼、傣、景颇、佤、拉祜、纳西、阿昌、德昂、独龙、傈僳、怒、普米、基诺、布朗等族的文学概况,此项工作已从1986年全面展开。民族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是民族文学的重大基本建设工程。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这方面,也已结合工作初步写出了一批探索性文章。在理论专著方面,已出版了朱宜初、李子贤主编《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王松著《傣族诗歌发展初探》,赵棹著《论白族神话和密教》,张福三、傅光宇著《西南少数民族古代文学探索:原始人心目中的世界》,以及李纛绪编《阿诗玛原始资料集》,《思想战线》编辑部编《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杨知勇、李子贤、秦家华编《云南少数民族婚俗志》。中国民研会云南分会编辑了《云南民俗集刊》,不少地州市还编辑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风物志》等。整个研究工作正在逐步深入。

三是队伍的培养。“文化大革命”前,我省民族民间文学工作队伍,主要是由老文艺工作者、基层文艺工作者、新培养的年轻专业人才、各民族歌手艺人和译员等组成,以汉族的文艺工作者为主。在工作中,专业文艺工作者与业余文艺工作者相互结合,汉族文艺工作者与各民族知识分子、歌手、艺人相结合,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从而培养了一批翻译人员,如陈贵培;也帮助一批歌手、艺人得到提高,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好作品,并译成汉文出版发行。如傣族歌手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合著短诗集《三个傣族歌手唱北京》,康朗甩长诗《傣家人之歌》和短诗集《从森林眺望北京》,康朗英长诗《流沙河之歌》,波玉温长诗《彩虹》,庄相长诗《幸福的种子》等;白族歌手,如张明德短诗《金鸡三唱》、长诗《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白族大本曲艺人杨汉《大理好风光》,黑明星《上关花》等;纳西族歌手,如和锡典长诗《玉龙山之歌》、《云雀之歌》,和顺良长诗《诉苦调》等;傈僳族歌手,如李四益长诗《琵琶声响幸福长》等。为了团结歌手和艺人,大理州还组织了“大本曲协会”,西双版纳组织了“赞哈协会”。10年浩劫中,这支队伍曾一度被打散,歌手艺人遭到迫害,有的含恨离世。但粉碎“四人帮”后,这支队伍重新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及部分师专中文系有3000多名学生选修了民间文学课程并参加了实际调查。在深入开展抢救整理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进程中,通过办培训班培训了骨干近千人,并不断发现了一批中青年歌手,在各民族中也出现一批抢救本民族文学遗产的文艺干部,他们很有希望成长为民族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

大 事

1919年前

“五·四”运动前，云南已出现白话文。1906年10月15日，在日本创刊的《云南杂志》即刊载白话文。1908年4月创刊的《滇话》月刊，纯用白话。1908年出版《丽江白话报》，1909年创刊《永昌白话报》。这些都是“五·四”运动前云南使用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滥觞。

1919年

云南学生联合会创刊《学生爱国会周刊》，重视刊载文学创作和文学论文，以后云南报刊纷纷发表新文学作品。

1920年

云南省立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滇潮》创刊，《滇潮》刊载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文章。

1923年

2月《翠湖之友》创刊，为云南最早的一份文学期刊。

1924年

5月 文学期刊《云波》创刊。

1928年

冬《云南民众日报》创刊，副刊为《象牙塔里》、《杂货店》，后改为《银光》，刊载了大量诗歌、小说和杂文、随笔。

1930年

《民国日报》副刊《杜鹃》随报创刊。

1933年

《昆潮》半月刊在昆明创刊。

1934年

《民族文学》月刊在昆明创刊。

1937年

8月 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筹备会成立。
11月15日《文艺季刊》创刊，1939年7月28日停刊。

1938年

5月1日 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改组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1939年11月8日改称昆明分会。

7月13日“文协”分会《文化岗位》创刊。

8月 救亡诗歌社创办大型诗歌月刊《战歌》，作为“文协”分会的刊物。此刊为全国性诗刊，影响及于全国。

西南联合大学迁入昆明后，从1938年至4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先后到云南中部、东南部进行民族、民俗和民间文学调查，调查报告和论文陆续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搜集成册出版。

1939年

5月4日《云南日报》副刊《南风》创刊。

1940年

年初 西南联合大学冬青文艺社成立。该社除出版壁报、手抄本《冬青》杂志外，还

出版《街头诗页》，并在贵阳《革命日报》（《贵州日报》）辟出《冬青诗抄》，还组织诗歌朗诵会、演讲会、座谈会、文艺晚会等，有许多教师、学生和校外文艺爱好者参加。

10月10日《诗与散文》创刊。该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诗歌与散文》，1952年自动停刊。

1941年

1月2日《中央日报》（昆明版）“文艺”副刊创刊。

10月 西南联合大学文聚社成立 出版期刊《文聚》。

12月1日《云南民国日报》副刊《读书园地》创刊，《读书园地》刊载过大量文学作品。

1943年

11月1日《扫荡报》副刊随报在昆明复刊。

《枫林文艺》创刊。

1944年

4月9日 西南联合大学新诗社成立，该社举办过多次诗歌朗诵会，推动学生运动，为新诗走向社会作出了贡献。

1945年

7月7日 昆明文艺工作者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举行“抗战八年来文化运动检讨会”，联合发表《关于当前危局的主张》，暨后又发表《昆明文化界争取出版自由的宣言》。

9月24日“文协”昆明部分理事和在昆文艺工作者，在北门出版社召开文艺民主问题座谈会，推动了昆明的文艺运动。

“文协”昆明分会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募捐救济贫病作家的号召，1周内即募得45万元，又举办音乐会义演募得60万元。

1949年

7月 文艺工作者联谊会（地下文联）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文艺团队，搜集过民族民间歌谣，加以改编和再创作。

1950年

6月 昆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昆明文联筹委会”，亦有“中国文联昆明分会筹委会”之称）正式成立。个人会员431人，团体会员29个。其中文协个人会员200人，团体会员1个。“昆明文联筹委会”领导4种期刊：《诗歌与散文》、《正义报》副刊《大千》、《影与剧》、《云南文艺》。

11月26日《云南日报》副刊《云南文艺》创刊，中华全国文联昆明分会筹委会（即“昆明文联筹委会”）编辑。

12月6日 云南军区政治部文化科，为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号召，召开部队创作会议。

12月 出版《云南文艺》杂志、《影与剧》周刊和“云南文艺丛书”。

1951年

4月7日 昆明文联筹委会在《云南日报》上刊登“掀起抗美援朝的文艺创作运动 举办第一次文艺奖金办法草案”的通知。

5月 云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将原办的以发表剧本和演唱材料为主的刊物《文娱生活》，改为《文艺生活》月刊。

6月 为纪念昆明文联筹委会成立1周年，出版了《云南文艺》杂志的《昆明文联周年纪念特刊》。

6月17日《云南日报》开始发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

7月 为响应全国文联关于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鲁迅号”飞机的活动，昆明文学工作者协会发动《云南文艺》、《诗歌与散文》、《大千》的作者捐献稿费。

11月15~17日 召开云南省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会议，宣告云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决议中有一项是建立云南兄弟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

12月23日《云南文艺》副刊编辑室全体人员因即将下乡参加土地改革，暂时停刊。《云南文艺》副刊共办30期。

1952年

春季 省文联下属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赴弥渡、祥云等县参加土地改革。

5月22日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云南省、昆明市文学艺术界、教育界及有关单位百余人集会。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长郑伯克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两年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一、不少文艺工作者参加了实际斗争，思想开始有了改造；二、工农兵大众的作品在文艺界已受到重视；三、出现了

以工农兵及兄弟民族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四、旧的戏曲得到了初步改造。

8月19日 省文联筹委会召开省、市文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有关文艺整风的具体事宜。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检查解放以来的非工人阶级文艺思想对自己的侵蚀与影响，以迎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

9月12日 省文联筹委会举办工农兵文学创作征文。

本年 自昆明文联筹委会于1951年发出“抗美援朝征文”的通知后，收到各类作品402件 其中文学作品 144件。经征文评奖委员会评选，有20篇文学作品获奖。

1953年

1月18日 省文联筹委会举办的工农兵文学创作征文，评出得奖作品53篇，举行颁奖大会。大会指出这次征文是在云南专业文艺工作者整风，批判脱离政治、脱离实际、不关心工农兵群众斗争的文艺思想之后，为人民群众办的一件好事。

3月11~13日 省文联筹委会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议号召云南省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展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文艺创作运动。会后，部分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深入生活，创作反映云南现实斗争生活的文艺作品。

5月9日 云南省文联筹委会为贯彻中央和西南区关于加强创作、整调组织机构的决定，将“云南省文艺界联合会”筹委会，改名为“云南省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下设创作研究、辅导、编辑3个部，结束原有各个协会及市、县文联，取消团体会员，吸收真正有创作能力者为文联委员。同时，成立创作委员会，组织歌剧、话剧、矿山、农村、美术5个创作组。从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抽调有创作能力的人参加创作组。5个创作组共30人，于5月中旬分别下乡下厂，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和搜集各民族民间文艺。

1954年

1月16日 由省文联筹委会编辑的《云南日报》副刊——《文艺生活》正式创刊。

11月13日 省文联筹委会组织文艺干部，学习李希凡、蓝翎及《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文章，检查了崇拜“权威”、轻视民族遗产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秋季 云南军区部队文艺读物编辑室，编选和出版一套反映云南边防部队现实生活的作品《边疆文艺选集》。

11月28日 省文联筹委会邀请省文化局、省图书馆、云南大学中文系、昆明师范学院等单位，讨论如何有计划有组织地在昆明文学艺术界开展关于《红楼梦》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这次讨论，历时4个多月。

1955年

3月15日 省文联筹委会建立民族文艺研究委员会。

5月《文艺生活》发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

5月25日 云南日报社和省文联筹委会联合邀集昆明文化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1400多人，举行“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座谈会，建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并把胡风从文艺队伍中清洗出去。

1956年

1月《边疆文艺》创刊。《文艺生活》于1955年12月终刊。

3月2~5日 成立云南省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以下简称“省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以下简称“作协昆明分会”）。作协昆明分会下设有民族文学工作委员会。

《边疆文艺》7月号，发表“发掘整理民族遗产的讨论”文章，通过对《望夫云》的讨论，划清整理和再创作的界限。

8~9月 作协昆明分会组织3个调查小组，分赴红河、大理、思茅、丽江等地，调查傣、白、彝、纳西、哈尼、土家等族的文学状况。

9月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云南民间文学调查组，到云南白族、纳西族地区调查民间文学，历时3个月。

11月20~25日 省民族民间文学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

同月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云南民族文学资料》第一辑。1962年由作协昆明分会等内部印行至第四辑。

1957年

1月《边疆文艺》改版，由原来的32开本改为16开本。

10月14~19日、25日 省文联和作协昆明分会联合召开云南省反击“右派”大会。会上被点名批判的，有蓝芒、麻采、欧小牧、白桦、公刘、周良沛、彭荆风、刘欣、朱江、姚冷等人。

11月14~26日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召开批判斗争党内“右派”分子黄铁大会。

1958年

1月 省文联和作协昆明分会批准一批作家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和基层工作。

3月 云南省文化艺术界召开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作协昆明分会、各艺术团体

云南人民出版社都提出自己的跃进指标。

5月 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大跃进山歌》第一辑。

6月《边疆文艺》6月号开辟“各民族民歌专号”，发表各民族民歌180首。

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各民族民歌集《歌唱恩人毛主席》。

7月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召开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布置了搜集、编辑民间文学作品选及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印《云南各民族大跃进民歌选》第一辑。1959年出第二辑。

9月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根据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要求，召开专门会议，商讨编选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及各民族文学史，向建国10周年献礼。会上，成立了少数民族（彝族、傣族、白族、纳西族）文学史、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故事长诗、地方戏曲和曲艺5个编选小组。会后，抽调云南大学中文系、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及部分教师，以及云南省文化局所属音乐工作者116人，组成6个调查队，分赴西双版纳、德宏、楚雄、大理、丽江、文山，进行民族民间文学调查、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及编写文学史的工作。此次调查，历时半年。

12月30日《边疆文艺》编辑部邀请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两校中文系部分师生，以及云南中学教师进修学校部分教师30余人举行座谈会，讨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暨后，又发表了讨论文章。

本年 作协昆明分会民族民间文学委员会编印《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发行。至1962年，陆续编印至第九辑。

1959年

3月《边疆文艺》3月号，开辟“国庆十周年文艺创作献礼”专栏。

5月2日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为促进儿童文学创作，成立昆明市文艺业余创作小组。组员16人，多为小学教师。

12月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白族文学史》（初稿）

1960年

2月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纳西族文学史》初稿。

5月 云南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分赴耿马、金平、调查傣族民间文学。昆明师范学院文史系部分师生，分赴德宏、澜沧、昭通等地，搜集、调查景颇、拉祜、苗3个民族的民间文学。

9月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作协昆明分会、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省歌舞团、省川剧团等，组成省民族民间文学沧源调查队，调查佤族民间文学。

本年 作协昆明分会在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组织作

家上山下乡、繁荣文艺创作等方面成绩显著，获云南文教系统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颁发了奖状。

1961年

2月《边疆文艺》2~6月号，发表文章讨论根据傣族长诗《葫芦信》改编为川剧的问题，讨论文章涉及整理与改编的界限以及古为今用等问题。暨后又将讨论文章编印成册。

从4月起，云南群众艺术馆编辑出版的《演唱月刊》合并入《边疆文艺》。

1962年

3月 云南大学中文系师生35人，组成省民族民间文学西双版纳、迪庆、宁蒗（小凉山）3个调查队，搜集调查傣、藏、彝民间文学。

9月26日 作协昆明分会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诗歌朗诵会。

1963年

1月 从本年1月起，《文艺报》、《文学评论》、《北京文艺》、《文汇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评论刘澍德的《归家》（上部）的文章共29篇。这些文章，对《归家》的主题、人物塑造、语言特色的评价褒贬不一，引起了激烈争论。

7月1~9日 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作了讲话，勉励云南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更高地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更好地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

1964年

1月3日 中共云南省委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座谈会着重讨论文艺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书记处书记赵健民、省委常委刘披云出席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云南的作家、演员和音乐、舞蹈、美术、戏曲工作者、大学教师、报刊编辑及省、市、昆明部队各文艺单位负责人。云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省文化局、昆明部队文化部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赵健民在讲话中指出存在问题：“总的说来就是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艺术，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还不相适应”。他希望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成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武器，成为防止修正主义的武器”。阎红彦在会上作了插话。会后，云南文艺界贯彻了会议精神。

12月 作协昆明分会发出“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厂史、社史、村史、家史、各民族新民歌征文”的通知。

1965年

1~4月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派出工作组于1月中旬进驻云南省文联，开展“四清”工作。

6月11日 中共昆明市委员会召开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卫生各条战线上的党委、文化部门、行政部门、工会、共青团的宣传干部、文艺团体、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800余人的文艺创作动员大会。7月21日、22日，又召开了各条战线上200余人参加的创作会议。

10月14日 作协昆明分会召开理事会，讨论文学如何更切实地深入地为农村，特别是山区、边疆民族地区服务的问题。理事会认为：要向山区和民族地区“雪里送炭”，推动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大力提倡讲革命故事，开展新民歌、新说唱等演唱活动，培养工农兵业余文学创作者。

1966年

2月12日 云南文艺界联合会举行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谢瑶环》的批判会。暨后，发表了批判这两株“大毒草”的文章和其他批判文章。

3月《边疆文艺》3月号，发表《努力塑造各民族的当代英雄》的社论，要求文艺工作者“大写英雄人物，塑造各民族的当代英雄形象”。

6月《边疆文艺》5、6月号合刊。在发表了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兵临城下》的文章后停刊。

6月6日《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史常真（即李孟北）的杂文《滇云漫谭》。

7月19日《云南日报》开始发表批判李广田的《花潮》、《山色及其他》、《或人日记抄》、《一滴蜜》、《线秀》等作品的文章。

8月7日《云南日报》发表批判根据刘澍德小说《桥》改编的电影《两家人》的文章。

1967年

5月24日 昆明地区造反派10万余人在检阅台举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大会，宣布“要彻底批判文艺黑线，斩断他们伸向云南的黑手”。

7月22日《云南日报》刊载“云南工农兵文联革命造反派联合战斗团”的文章《阎红彦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罪魁祸首》一文。文章中称：由于原省委书记阎红

彦贯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把云南文艺界搞得谬论百出，毒草丛生，乌烟瘴气，把云南变成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阵地”。

1968年

11月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省文联和作协昆明分会是“文艺黑线”单位，应“彻底砸烂”。紧接着搬走办公家具和办公用品，省文联和作协昆明分会被迫停止活动。

12月 云南省文联和作协昆明分会全体人员随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下放到弥勒“云南第一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进行“斗、批、改”。在后来的“站队划线”和“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很多作家受到批判和斗争。

1969年

5月28日《云南日报》发表批判《李定国》、《元江烽火》、《孔雀公主》、《望夫云》、《葫芦信》的文章，还批评阎红彦、赵健民在文艺战线上搞的是“和平边疆”、“边疆特殊”，并批评大抓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是“抹煞阶级斗争”。

11月6日《云南日报》发表批判《阿诗玛》的文章。

秋季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下属的文化组撤销，恢复云南省文化局。云南省文化局之下的文艺组，实际上担负了原文化局艺术处的职责；云南省文化局下属的创作室，取代了原云南省文联的工作，负责组织文艺创作和出版文艺期刊。

本年 由云南文化局创作室编辑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双月刊）创刊（到1973年6月终刊）。

1970年

8月25日《云南日报》开始发表批判影片《五朵金花》的文章。

1971年

2月7日《云南日报》再次连续发表批判电影《五朵金花》的文章。

4月《文艺战讯》第四期，刊登一组批判《五朵金花》的文章。

5月22日《云南日报》开辟文艺副刊《万山红遍》。

1973年

8月 云南省文化局创作室主编的《云南文艺》（双月刊）创刊。

1974年

3月9日 云南省、昆明市文艺、教育、出版、新闻等部门人员和参加省文艺创作剧目调演大会的全体人员共同批判晋剧《三上桃峰》。

10月《云南文艺》第五期转载初澜颂扬江青“功绩”的文章《京剧革命十年》。

8~12月 云南省文艺界的一些人，秉承江青“批大儒”的旨意，创作了一个“八场革命历史话剧”《柳下跖》。

1975年

上半年 云南省文艺界进行整顿。军代表撤走，另委派云南文化局革委会主任和创作室主任。

10月《云南文艺》第五期转载《红旗》杂志短评《重视 水浒 的评论》，并发表批判《水浒》宣扬投降、搞修正主义的文章，对宋江进行批判。暨后连续发表文章、召开座谈会，批判《水浒》。

夏季 云南省文化局召集各地州主管文艺的负责人和部分文艺工作者参加的文学、电影、戏剧创作座谈会，又称“中长篇创作会议”。会上，部分与会者根据党中央“整顿文艺”的精神，对“文化大革命”以来践踏“双百”方针强制推广样板戏创作经验十分不满，抨击“三突出”的所谓“创作原则”。与会者认为：“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束缚创作思想，简直像“紧箍咒”，“土基模子”，造成文艺创作的雷同化。这是云南文艺工作者对当时的文艺政策的一次公开的尖锐的批评。

1976年

1月《云南文艺》从1月份起，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在改刊的1976年第一期《稿约》中提示：“改刊后，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突出云南的边疆民族特色”。

3月《云南文艺》第三期，以显著地位转载《人民日报》1976年3月9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和初澜的文章《坚持革命文艺，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期，还刊《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在此之前，云南省已有人把“中长篇会议”诬为“黑会”，并作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事件向江青和文化部告状。文化部为此事件专门派了工作组来云南调查，形成了所谓“中长篇会议事件”。这一件事，成为江青等人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回潮”的“钢鞭材料”和“重磅炸弹”。

5月 云南文艺界少数人，在云南省文化局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炮制了鼓吹篡党夺